

佟 君◎主编

华南日本研究 · 4 ·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佟君◎主编

华南日本研究 · 4 ·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华南日本研究》第4辑,收录了有关日本文学、日本文化、日本语言及日本综合等研究的论文30余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华南地区日本研究的现状,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适合日语研究者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南日语研究(第4辑)/佟君主编.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0723-7

I. ①华… II. ①佟… III. ①日本-研究-文集
IV. ①K31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4931号

华南日本研究(第4辑)

主 编:佟 君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 版 人:韩建民

印 刷: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字 数:502千字

版 次:2014年12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313-10723-7/K

定 价:48.00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19.25

印 次: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 读 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5-83657309

《华南日本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办单位：中山大学华南日本研究所

出版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主 编：佟 君

副 主 编：谢崇宁

编 委：詹懿虹(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王益鸣(华南师范大学)

王 毓(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刘金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李春植(广东商学院)

李 晶(广东海洋大学)

贾海平(华南理工大学)

包志荣(广东工业大学)

庞光华(五邑大学)

张 磊(暨南大学)

杨 曼(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龙开胜(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华南日本研究所 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

杨中艺、佟 君、麻国庆、黄仕忠、谢崇宁

王建新(兰州大学)

顾也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陈多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丁国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王 琢(暨南大学)

张 捷(暨南大学)

李远喜(华南理工大学)

李春植(广东商学院)

王益鸣(华南师范大学)

李雁南(华南师范大学)

李 晶(广东海洋大学)

林青华(广东工业大学)

刘金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庞光华(五邑大学)

《华南日本研究》第4辑序言

《华南日本研究》第4辑能够得以顺利出版,首先要感谢日本国 iam & interworks 的支持,也十分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陈勤女士的鼎力支援,也感谢日本、港澳台及大陆学者的厚爱与不吝赐稿!

《华南日本研究》的缘起似可追溯到2001年12月8日至12日由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日比较文学会及日本和汉比较文学会联合举办主题为“2001中日比较文学国际学术会议——新世纪中日文学关系的展望与回顾”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翌年即2002年12月6日“中山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更名为“中山大学华南日本研究所”,2003年11月终于成功收录了41篇来自于海内外的日本研究论文的《中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由中山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2月出版发行,我们视为华南日本研究所的《华南日本研究》第1辑。在时隔4年之后的2009年6月,我们在AEON信贷财务(亚洲)有限公司(AEON CREDIT SERVICE(ASIA) CO., LTD.)的“AEON教育及环保基金”的支持下出版了《华南日本研究》第2辑,而在2010年7月连续出版了第3辑,在此再次深表谢忱!

此次的《华南日本研究》第四辑共收录了有关日本文学、日本文化、日本语言及日本综合等研究的论文30余篇。此次的赐稿者当中既有在日本研究各个领域引领主流研究前沿的学者,也有学术中坚力量,更有一些初入学术领域并在学术起跑线上刚刚起步的具有一定潜质的青年才俊。我们总是强调,对于后起之秀的青年学者们,基于《华南日本研究》刊行的宗旨之一,我们特别希望给予青年学者以帮助,给他们提供一个学习、研究以及发表的学术园地,从而起到一种在学术起跑线上的助跑作用。同时,我们也十分感谢国内外主流学者的不吝赐稿和悉心指导,期待着《华南日本研究》能够顺利地刊行下去,以期为学界读者奉送更好的日本学术研究成果,更加希望日本研究方面的同仁们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华南日本研究》。

值此《华南日本研究》第4辑即将出版之际,我们再次感谢 iam & interworks 的后援,并对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陈勤女士以及社团法人广州留东同学会会员的鼎力支持表达衷心的感谢!

《华南日本研究》主编

佟君

写于中山大学华南日本研究所

二〇一四年九月六日

目 录

· 文学研究 ·

从“反战”到“反殖民主义”——黑岛传治《武装城市》的意义	島村輝(2)
日本草庵茶中所表现的隐逸精神	丁国旗(7)
论文学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以林少华译 2007 年上海译文版《挪威的森林》为中心	张文恒(14)
日本近代女性写作的诉求——田村俊子的女性自我书写	童晓薇(34)
《伊豆舞女》之研究	马莹妮(42)
解剖《鼻子》——镜子里的梦	邓宇阳(49)

· 语言研究 ·

对音研究举例	庞光华(56)
中日“亲属称谓语”差异成因及语用效果试析	刘金举(66)
利用计算机对日语教科书进行的试验性分析	叶 飞(74)
关于中国日语学习者学习策略的调查研究	
——从学习者的性别差异、学习背景差异的角度出发	张金龙 李友敏(82)
关于“中译日最新发布词汇之一”的探讨	郭文娟(95)
关于“中译日最新发布词汇之二、三”的辨析	郭鸿雁(103)
试论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动机的研究	郭俊海(116)
浅谈形式体言的辨析方法	李 博(122)
命令语气的日汉对比研究	胡志强 武 锐 秦礼君(126)
汉语的介词与日语格助词之比较——以“从”和“から”为例	夏迪娅·伊布拉音(135)
浅议周边性现象的研究	何 婷(141)
母語についての研究	何俊山(145)
台湾人大学生の日本語学習の動機づけについて	
——技術系大学の大学生を対象に——	蔡爱玲 蔡爱芬(151)

· 文化研究 ·

草野心平的亚洲认识	陈多友(166)
鲁迅与盐谷温的治学及其学术关系	谢崇宁(174)
探寻“壬生(融通大念佛)狂言”——以和久里融通大念佛为中心	村上美登志(181)
“和久里融通大念佛狂言”的世界——祈祷的形象	村上美登志(188)
关于日本民主党的友爱哲学	佟 君(195)
中日比较视野中的“中国模式”	刘 军(201)
日本人为何恐惧“宗教”——亚洲化视野下日本宗教的变容	青山玲二郎(210)

试析日本义务教育法规的文化特征与启示	郭鸿雁 佟 君(215)
从日本幼儿教育立法看日本人集团主义的形成	陈欣亿(220)
日本关西国际中心对外语言教学管理模式 ——以研究者日本語研修课程为例	陈凤川(224)
日本和服文化	周珂珂(229)
本田汽车落户广州的基础研究	倪小坚 杜雨霏 宋晓真(234)
在日企业员工组织公民行为调查研究	王英燕(256)
明治漢学者那珂通世における戦争観 ——『修身教育勅語講義』を手がかりに	孫 倩(264)
东密、台密历史文物之研覈	王一鸣(267)
律令、佛教、文学的交织 ——围绕唐代口语中“颜面”一词讲说的场合	藏中詩儂笑(276)
 · 附录 ·	
日本国命名年考	庞光华(286)
广州与博多的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罗晃朝(289)

· 文学研究 ·

从“反战”到“反殖民主义”

——黑岛传治《武装城市》的意义

(日本)フェリス学院大学 島村輝

【摘要】近些年来,日本右翼保守势力企图正当化日本殖民主义侵略史的行为日益猖獗,引起东亚知识人的警觉。在如此背景下,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研究迅速回温。其中,被公认为左翼文学创作最高成就的、黑岛传治的长篇小说《武装城市》自然成为了焦点。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作品中塑造的人物明显地成为了“殖民主义者”的隐喻;作家字里行间的历史指涉亦与现今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篡改历史的事实发生了直接的隐喻关系。正因为如此,对该文本意义的重新解读显得尤为重要,借此可以产生更多问题意识,发掘出更为丰富的批评话语,去迎拒时代逆流,解构右翼保守势力的思想谬传。

【关键词】反殖民主义 无产阶级文学 隐喻

一、“历史教科书事件”/重读《武装城市》

今年(2001)三月,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持编写、扶桑社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通过了文部科学省的审定;如果各地方自治体教育委员会再通过采纳决定,来年春季就可能在中学开始实际使用。这本教科书根据审定意见对137处加以修订,其内容有如关于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的“国民对政府软弱的外交政策极为不满,热烈支持关东军的行动”等表述,而对称攻击珍珠湾为奇袭等却未见任何修改。如此这般修订的各处,都表现出要使基于一国历史观的“日本”正当化的态度,这是“新历史教科书”的整体特征。

众所周知,这本教科书审定合格,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批判,尤其是直接受到过日本殖民统治的中国、韩国。他们不仅把这当作过去的历史问题,更是站在现在和如何思考未来东亚地区关系的立场上对其进行严厉的批判。当然,来自外国的批判内容不尽相同,批判的正确与否也应该考虑到当时政治上、外交上的背景。然而,现在的日本正值“战后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受到根本怀疑之时,过去的日本具有怎样的“殖民主义”的历史?它又是如何规定着当代“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的状况?这些都是应该负起“战后责任”的日本人要加以深刻思考的。

当战前日本殖民主义向大陆伸出侵略之手时候,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迎来了自己的鼎盛时期。当时,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表明了包括反对战争、反对民族压迫、反对殖民主义等立场,但是从实际创作出的作品以及当时对这些作品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最终还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这一以日本国内的政治课题为前提的“革命”文学占主流地位,而正面描写包括北海道和冲绳等的殖民主义问题,尤其是正面涉及对中国台湾、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殖民侵略的实际情况的作品却寥寥无几。在这种几乎一边倒的时势中,为很多评家所看好的黑岛传治(1898~1943)的

《武装城市》更显出独放异彩的艺术魅力。

《武装城市》是黑岛传治唯一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经过大幅删减,于1930年11月由日本评论社出版发行,旋即被禁止发行。此后虽然作者要以《国境》、《前哨》等几个短篇的形式发表,但由于抱病在身的结核恶化住院疗养,直到1943年病故,也没有找到可以和这部小说相匹敌的工作。从这一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把《武装城市》看作黑岛传治小说创作的集大成。

黑岛传治写作《武装城市》之前的风格,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一是细致刻画挣扎在贫困生活中的劳动人民形象的《电报》(1926)和《两分铜币》(1926)等;一是以他自己西伯利亚从军体验为素材的反战、反军队小说《雪橇》(1928)和《一群盘旋的乌鸦》(1927)等。处于这两种作品之间的《猪群》(1927)是描写受尽虐待的农民阶级反抗斗争的成名作。可以说,黑岛传治最初关注的是经济拮据、被各种烦扰和困惑所束缚住手脚而苦苦挣扎、最终却被迫以不幸而告终的百姓的生活;继而他又看到了在被纳入军队这一强大的机构内,虽然十分强烈地感觉到无奈,但却被这一强大的力量驱使着的士兵们的命运。这两种视线的融合就诞生了描写正在受到侵略的殖民城市的具有现实性的《武装城市》的构想。这种创作风格上的转变,就黑岛传治的全部创作而言,可以说是完成了两个层次转变后的必然结果。这两个层次的转变:一是由日本国内向国外——中国大陆的转变,一是由“反战”向“反殖民主义”的转变。在此,我们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两个层次之间是呈互动或互为因果关系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来,黑岛传治的《武装城市》显然不同于主流的文学创作,但是比他同时代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却有着更为开阔的艺术视野。

当时,在国际上,中国大陆饱受以日本和美国为首的各国侵略;在国内,军阀割据、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也在扩展开来,整个中国成了内战的舞台。作为《武装城市》舞台的济南不仅处在这样大的利害冲突之中,同时还遭受着殖民主义日本的资本入侵。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日本政府决定再次出兵山东,26日日本军进驻山东。日本军以保护侨民的名义,“武装”日本资本保护伞下的工厂,进入临战状态。5月3日,济南市内发生掠夺事件,以此为契机,中日军队进入交战状态。此时主张“恢复国权”的北伐军正在北伐途中,所以发生冲突也在情理之中。这次战斗,日军死伤230人,中国军队死伤2000人,日本“侨民”也有16人死亡。至此,济南成为中日复杂关系的焦点,也成了象征殖民主义时代开始的历史见证。

由此可见,黑岛传治选择济南作为作品的背景意义重大。黑岛所要描写的决不是军阀之间、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势力之争,也不是统治殖民地的日本等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他所要表现的是作为酿成“济南事变”这种军事、政治冲突事件的根基的“殖民主义”的罪恶,以及生活在这个殖民城市里的殖民者(colon)日本人是怎样的方式走向荒废和颓废的。可以说,黑岛以他一流的细腻的现实主义手法,使得在“殖民主义”的状况下的《武装城市》没有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暴露历史真相的小说。

二、“济南事变”/《武装城市》

据推测,黑岛生前未完成未发表的《支那(当年日本人对中国的蔑称——译者)见闻记》执笔于1930年。在这部游记中他写道:“从去年10月到11月,我游览了支那北部一些地方。”这次旅行他到了济南、天津和奉天(今沈阳)等地。他不只是游山玩水,而是要亲眼看一下日本对大陆殖民侵略的实际情况。在日本国内,宣传报道口径统一:日本出兵山东是为了保护生活在济南的“侨民”,事变(济南事变)本身的最大受害者仿佛是日本“侨民”。正是在这种一边倒的宣传中,黑岛传治却要去中国亲眼确认这一事件的真相。

如前所述,济南事变于1928年5月3日爆发,南京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上诉,要求日本立即撤兵。对此,日本反而要求惩罚中国革命军领导人,立即停止排日宣传。日军首脑部门认为,济南事变是奇祸——奇货,必须借此一并解决包括满蒙问题在内的一切问题。但是,田中义一首相认为,只要这次战祸不涉及满蒙问题,就要采取不干涉内政的方针。可见,日本指挥部门也处在复杂的政治纠纷中。在这一状况下,日本政府从6月到7月把对“济南事件”的决定付诸实际:7月16日开始撤兵,翌年5月13日撤兵完毕,历时9个月。黑岛传治访问济南是这一年的10月份。

距撤兵完毕不满半年、距事件爆发不过一年半的济南,虽然已有国民党的势力进入,但事件的痕迹依然历历在目。从当时属于国民党的报纸《山东民国日报》上,就可以清楚显示出济南与日本的关系被怎样的空气所包围着。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唤起事变记忆、号召中国人爱国精神的广告和报道。9月2日的报纸上登有“五三商社”的招聘广告:“爱国者到五三商社去”;还有“本省将建五三纪念堂在大明湖铁公祠内,预计建筑费十万元”的报道。

同时更引人注目的是揭露日本人在济南市所犯下罪行的报道:“乐极生悲 日领馆翻译金田乘车轧伤我警官,打趣妓其乐陶陶,乘车伤人”; (9月7日)“两名日本犯人,一名板根伴吉系枪弹犯,一名苍堪得一系毒品犯”。(9月18日)与这些日本人殖民者的个人犯罪同时报道的还有10月3日的“帝国主义的遗惠,炸弹又炸伤了人”的事件。

到了10月,在当时打击鸦片的运动中,关于揭发检举日本人有组织地贩卖鸦片的报道增加了。继这篇9月18日的报道之后,20日又有以“日人在沧口贩卖毒品情形”为题的报道,列举了三个日本人的名字;21日又以“大快人心——制造毒品之日人总机关昨日查收”为题,报道了没收大量鸦片和制造工具的消息。在10月2日的“今日拒毒大会,焚烧大批毒品”的报道中,也可以看见《武装城市》中出现的“快上快”的名称。3日亦登载了宣传“拒毒大会”使这一运动深入开展的报道。4日的报道中也夹有“行政院通令禁种鸦片”的报道。7日以“毒品——由春山洋行搜出多种”为题,揭露了日本商社参与鸦片买卖的真相,同日的“市政周刊 拒毒专号”也有很多关于打击鸦片犯罪的报道。

在经济方面,青岛的横滨正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由于准备金不足,失去信用。对这种榨取中国民脂民膏的殖民主义金融资本的侵入,报纸更是以坚决的态度连日报道,旨在使正金银行关闭。

只要浏览一下《山东民国日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日军撤退了,但是日军留下的爪痕依然存在,日本殖民者依然横行霸道,尤其是在贩卖鸦片上比“济南事变”前有增无减。在此我们无法一一转述,除了这些报道之外,全国各地报纸都占一定版面,报道声讨日本殖民主义者正在中国大陆进行的侵略,真让人感到中国人对日本人已经是日益警惕。毋庸讳言,虽说日本军从市内撤军了,但是济南市与日本殖民主义、殖民者的关系却无法根除。黑岛传治访问前后的济南就笼罩在这样的氛围中。

黑岛在《支那见闻记》中写道:“笔记本是带去了,但是由于嫌麻烦、太累赘,所以什么都没有记录下来。照相机,带去了文艺战线社的,照片是照了不少,可是显影出来一看,有的跑光了,有的曝光时间过长,几乎一半什么都看不清楚”。然而,我们不能只从字面上理解这段话。虽然我们无法断定黑岛本人是否能够自由使用汉语,但是从《武装城市》中不时出现的汉语的书写方法看来,说他根本不懂汉语也是没有道理的。换言之,汉语即使用日本汉文式的读法写法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其通顺;并且,在济南为他做向导的熟人岛田清次郎汉语十分了得,所以至少通过岛田,黑岛也可以在这次旅行中为构思小说收集很多一手材料。这样想似乎比较稳妥。可以认为,正是由于到了济南,亲身接触到那里“殖民主义”的空气,竹三郎、山崎和中津等在殖民城市过着奇怪生

活的殖民者(colon)的形象才能活生生地树立起来。

三、“反殖民主义”/《武装城市》

在《武装城市》里,有各种各样栖息在殖民城市济南——过着奇怪生活的殖民者(colon)。这部作品当然要紧密结合作为背景的政治和经济的根据来描写战争,可是对此却决不仅止于图解式的解说,而是在此基础上给予读者作为小说的鲜明的形象——印象新鲜、激烈的殖民者(colon)们的形象。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部作品发表未几则有池田寿夫的高度评价:“对黑岛而言,这是他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最大的一部长篇力作,非但如此,这部作品也达到了迄今为止反战文学的最高水准。”同时池田也举出小说中的一些缺陷:“干太郎一家所费笔墨太多,巷战爆发起因的铺陈也过于庞杂。(池田寿夫,1932:4)”但是此后评论界却有不同的意见:“正是这一介土匪——恐怖分子的掠夺才是事件的导火索。只有在作品中明确了这一点,才能使读者接触到令人触目惊心的真实,从而能够对这一事件进行艺术的再现。(中茵荣助,1956:5)”今天看来,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正是通过这些殖民者的形象,黑岛传治为我们揭示了如此这般深刻的历史事实:殖民主义不仅给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居民们带来了灾祸,给殖民者自身也带来了深刻的道德上的颓废。这些当然都是黑岛最为拿手的细致入微的现实的描写力所起的作用。

事变前后的济南,鸦片蔓延成灾。如前所述,日本人的鸦片买卖是这一灾害的根源。在《武装城市》里,登场人物猪川竹三郎和他的一家都是从事鸦片买卖的。竹三郎本来是四国岛上一个农村的村会议员。他与村里的头头相争败北,在村里混不下去了,漂洋过海到了济南,开始做贩卖鸦片“快上快”的生意。这种生意随时冒着被揭发的危险,全家都为此寝食不安,在经济上也未能摆脱贫困状态。最后,竹三郎自己也成了“快上快”的瘾君子,在被揭发拘留期间,由于难挨禁断症状的折磨,终于用洗脸盆沿割断了自己的小脚趾,被保外就医,不久又再度贪恋“快上快”。

竹三郎是为了追求正义和村里头头抗争而失败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来,他是一个败在了日本陈旧制度下的被害者。但是作为被害者的竹三郎一到了殖民地城市济南,就摇身一变成了统治者、殖民者。因为这里有支撑日本侵略中国大陆的一整套把戏。

他们之所以可以在殖民地横行霸道,就是因为背后有日本的国家权力在撑腰。正如广津和郎所说:“日本的政治本身助长了这些家伙(殖民者)——蛮横的无赖之徒的威风,日本政治利用这些人的歪门邪道建成了满洲。(广津和郎,1957:6)”这不只是满洲的事实,日本的这种殖民主义政治也决定了日本对朝鲜半岛和对中国的政策。并且,济南作为这些殖民者在大陆各地游荡后的最终归宿更是意味深长:“在日本内地不能糊口,或是有法律上的麻烦,混不下去了,于是就先去朝鲜;朝鲜没有意思,再去满洲;满洲也没有意思,再去天津;天津也没有意思,就去北京;在北京也混不好,这些人就都拥到这里来。(黑岛传治,1970:20)”

山崎就是一个专走歪门邪道、寄生于济南殖民统治的人物。他是一个“大陆浪人”,靠收取“保密费”生活,在进驻济南的日本企业进进出出;他口袋里装着各个会社的名片,却不在任何会社上班;他的汉语说得和中国人一样流畅,这是他的武器;他和一个不明身份的中国人陈长财绞在一起,在北伐军游击队的隐蔽据点里看见了从美国运进武器的现场;“济南事变”一结束,他就为散布日本侨民被大屠杀的谣言而上窜下跳;在掠夺和破坏的现场与陈长财相遇,陈向他索要抵押物,被他杀害;可是紧接着他也被当作形迹可疑的中国人死在了日军哨兵的枪口下。

中津和山崎一样也是一个奇怪的人物——山东的日本侨民对他望而生畏,他是个破落的恶棍,给军阀张宗昌当军事顾问。竹三郎的女儿阿铃因倒卖鸦片在青岛被逮捕时,中津从中斡旋使

其获释,此后他迷恋上了比他年轻30岁的阿铃,并预谋在北伐军与日军对峙升级时劫持她。由于这一计划没能如愿,他就开始非法掠夺,以此为契机济南进入暴动状态,不久全面的巷战开始了。

此外,黑岛还通过对伪装成中国资本的“福隆火柴公司”经理内川和厂长小山等人物的描写,着力刻画这些昔日日本国内的局外人摇身一变成为殖民者后的生活状态。这是这部长篇小说的最主要特征之一。看到黑岛笔下所描写的这些奇怪的殖民者(colon)的形象,我们今天日本的读者怎能不对自己的历史位置和责任进行深刻的反省呢?并且,到底我们能不能说,今天东亚的“后殖民主义”时代已经真正摆脱了《武装城市》所描写的“殖民主义”时代的构图了呢?我们能说?还是不能说?

小说中还描写了试图与中国工人进行交往的年轻一代——猪川干太郎(竹太郎的儿子);也描写了日本士兵们对过度压榨中国工人的不满情绪。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比起对殖民者奇怪的生存状态的描写是有欠精彩的。

总之,今天我们重读《武装城市》的意义就在于:作者以“济南事变”前后济南这座殖民城市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利害关系为背景,鲜明地刻画出殖民者(colon)们奇怪的生存状态;殖民者作为加害者,同时也使自己走向了荒废,这大概正是在背后支撑着他们的日本殖民主义的一种隐喻(metaphor)。如果说新感觉派代表作家横光利一(1898~1947)的《上海》(1929)所描写的人物是上海这座城市的隐喻(metaphor)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武装城市》在某种意义上更直接地把出场人物当作了“殖民主义”的隐喻(metaphor)。《武装城市》在细节描写上,充分显示出黑岛非同一般的观察力;在描写细腻这一点上,这部小说堪称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最大的高峰。而且,在“新历史教科书事件”引起世人普遍严重的关注,人们越来越深刻警觉于“篡改历史”的当下,黑岛传治的《武装城市》也必将具有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本文译自《定本 黑岛传治全集 IV 解说》,勉诚出版社,2001年;暨南大学刘海利译)

参考文献:

- [1] 池田寿夫.批判过去的反战文学及其今后的方向[J].无产阶级文学.1932.
- [2] 中茵荣助.黑岛传治论——《武装城市》的里程碑[J].多喜二与百合子.1956.
- [3] 黑岛传治.黑岛传治全集 III[C].日本东京:筑摩书房,1970.
- [4] 广津和郎.关于“无赖汉”的意味[J].King.1957.

【作者简介】

岛村辉,男,1957年9月13日生,东京人,费利斯女学院大学教授。主攻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无产阶级文学。东京大学博士,女子美术大学教授,2009年4月赴任费利斯女学院大学文学部日本文学科教授。

日本草庵茶中所表现的隐逸精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丁国旗

【摘要】茶道是源于中国,在日本生根开花的生活艺术。茶从一开始就与禅结缘,即所谓的茶禅一味。利休一派的“侘茶”(空寂茶)将茶从生活境界提升至精神境界,通过严格的仪轨以及高度象征性的一系列程式,贯彻和敬清寂的理念,使其具备了超尘脱俗的修行和超越的意味。本论文通过对茶与禅的关系的观照,考察了草庵茶道的渊源流变,揭示了茶道从茶室到茶具诸要素中所承传的“山里”隐逸精神,观照了茶道中所表现的空寂之美、茶道对日本人审美观念与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论证了其与中国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键词】草庵茶 空寂 隐逸精神 茶禅一味 和敬清寂

序言

中国宋代的禅宗学说如潮水一般涌进日本后,进入了生活和艺术的诸多领域,在俳句、绘画、园林、儒学、武士道、茶道等方面都能看到禅的烙印。铃木大拙在他所著的《禅与日本文化》一书中指出,“我们需要注意到日本艺术的一些特征,它们与禅的世界观密不可分,可以说最初都是从禅中推导出来的。(铃木大拙,1989:15)”他的这本书共分七章,除第一章“禅学入门”之外,第二章到第七章分别以“禅与艺术”、“禅与武士道”、“禅与剑道”、“禅与儒学”、“禅与茶道”、“禅与俳句”为题,逐一论证了禅宗思想在各个领域的影响。

禅宗有一整套独特的审美理念。在禅的观念里面,大千世界并非实体存在,实体是“空性”,禅所注重的是对本然生命的发现。禅宗“色即空、空即色”,“一即多、多即一”的思想对日本美学和艺术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艺术形式和技巧手段上,而且影响到审美趣味和非功利的艺术观念,它直接催生了わび(空寂)、さび(闲寂)、“枯淡”、“幽玄”等一系列具有日本特色的美学范畴的出现。

茶由中国传入日本。茶汤原本不过是一种游艺,在日本,先是出现了效仿中国的贵族书院茶道。但经珠光、绍鸥、利休将其改变为草庵茶之后,茶事活动逐渐具有了修行的色彩,开始追求“枯淡闲寂”的境界,显露出“隐者性格”(数江教一,1973:26)。

日本的茶书中,有一篇名曰《绍鸥门徒法度》。其中有一条规定:茶人首要的是要有隐遁之心,意谓其生活态度要从本质上与隐者无异,而隐者必须彻底与孤独为伴,保持枯冷之心(数江教一,1973:135)。

由于篇幅所限,本论文拟就草庵茶道所体现的隐逸精神展开论述。茶道是一门综合艺术,从建筑样式到一应器物再到“和敬清寂”的理念,无不渗透着禅的趣味和孤高的隐遁精神。拙论旨在通过探寻草庵茶所传承的“山里”精神,透视日本人的审美意识(精神史)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关系。

下面就先来追溯一下茶道的源流。

一、茶道的渊源流变

日本人喝茶的习惯来源于中国。据说荣西在从中国返回时带回了茶种,并专门写了一卷《吃茶养生记》。日本茶道最初称作茶汤(自千利休的孙子千宗旦之后始称茶道)。在将军足利义政的东山时代,茶道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发达起来,它包括独特的建筑(茶室)、书画(挂轴)、茶花、陶艺(茶具,主要是茶碗)、一整套社交礼仪等。这种贵族书院里的茶汤原本以中国式茶席为模式,唐绘、唐物的高贵性及其神秘的美构成了茶汤的优雅的美的世界。但自16世纪室町时代后期、安土桃山时代以后,珠光、绍鸥开始主张以“空寂”作为茶道的基本精神,到了千利休明确提倡以这种基本精神为根本的草庵式茶道,茶道发展为“空寂茶道”(侘茶),茶道也由此被提升为艺术,到达了一个新的境界。千利休提出的“空寂茶道”,以“贫困”精神为本质。所谓“贫困”是指不追随世俗的浮艳而保持自我内心清淡闲适的人格精神。所以千利休的“空寂”茶道,首先将茶室简化为草庵式的木造结构建筑,且将茶室缩小,仅为二铺席乃至一铺半席的小面积;其次在茶室内配上在千利休指导下制作的日本式形状不匀称的粗茶碗——“乐茶碗”和质地素朴、色彩单一深沉的茶壶,在壁龛里挂一幅水墨画或简洁的字幅,摆放一个插上一朵小花或花蕾的花瓶;再次,品茶严格地按规范动作缓慢而有序地进行,造成一种静寂雅致的氛围。

(一) 草庵茶的开山——村田珠光

村田珠光(1423~1502年),奈良人。据说珠光青年时期一直在净土宗寺院——称名寺做和尚,后来因故离开该寺,漂泊四方。三十岁左右时,他来到京都大德寺真珠庵跟随一休宗纯参禅,并从一休那里获得印可证书——宋代临济宗著名禅师圆悟克勤“茶禅一味”的墨宝。

珠光得此墨宝之后,便将其悬挂于茶室的壁龛里,日日参悟,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草庵茶风,成为日本茶道之开山。在茶室壁龛里悬挂挂轴后来成为茶道的经典传统。室町时代的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隐居京都的东山,并在此修建了银阁寺,史称东山时代。在义政的文化侍从、杰出艺术家能阿弥的推荐下,村田珠光作了义政将军的茶道顾问。由于将军义政的推崇,草庵茶迅速在京城一带传播开来。

据说珠光常用下面这个典故启发弟子们。

有一个中国人作诗一首,拿给朋友看。其中有“前林深雪里,昨夜数枝开”两句,那位朋友建议他将“数枝”改为“一枝”,他欣然采纳,并称之为“一字师”。

珠光还说过:“观名马于蒿棚之中,善也;赏珍品于陋室之内,亦善也。(铃木大拙,1989:134)”

珠光通过将禅引入茶道,把茶道由日常活动提高为一种艺术、一种哲学、一种宗教。他摆脱了追求唐绘和唐物的书院茶道的华丽茶风,崇尚古朴、简素的风格,茶室里引入地炉等日本元素,大大推进了饮茶文化与本民族固有文化融合的进程,开创了与书院茶风异质的草庵茶道。

(二) 本来无一物——武野绍鸥

武野绍鸥(1502~1555),号一闲居士、大黑庵。他出身于堺市的一个商人之家。他出生的那一年,刚好珠光去世。他师从珠光的门下宗陈、宗悟学习茶道,他将日本的歌道理论融入茶道,在他的努力下,“侘茶”渐具雏形。

武野绍鸥认为,歌道与茶道在修行和艺术创造上是相通的。他用歌道理论印证他的茶道艺术理论,开创出一派新的茶道。

他曾用《新古今和歌集》中藤原定家的一首和歌来表现自己茶道的艺术境界：

“望不见春花，望不见红叶。海滨小茅屋，笼罩在秋暮”（滕军，1992：49）。

武野绍鸥的创新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将和歌艺术理论导入茶道；将日本本民族的审美趣味再现于茶道等等，对日本茶道的进一步民族化做出了很大贡献。

（三）草庵茶的集大成者——千利休

千利休（1521～1591年）是村田珠光的第三代弟子。茶道在他手上才最终完形，他是日本茶道艺术的集大成者。

首先，他明确提出“和、敬、清、寂”，并将之确立为日本茶道的基本精神。

其次，以四叠半席为准，把茶室改为小间。典型的日本茶室入口很小，需伏身而进。在茶室外形上，则采取中古农家的草庵式样：中间以一根粗皮老树为柱，以竹木芦草做成尖顶覆盖其上，努力营造出一种山野趣味。

日本茶道发展到千利休创立的“空寂茶”^①时，更充分地表达了禅意和禅趣的精神追求。《南方录》卷首记载了千利休的这样一段话：“草庵茶的第一要事：以佛法修行得道。追求豪华住宅、美味珍馐是俗世之举。家以不漏雨，饭以不饿肚为足。此佛教之教诲，茶道之本意。”（滕军，1992：61）

因为这个理念，利休的空寂茶具有了自己显明的特质。它既不同于书院茶，也与丰臣秀吉的黄金茶室迥异其趣。

据说，秀吉的黄金茶室约有三叠大，草席以猩猩皮包裹，走廊及地板铺着绫罗绸缎，天花板、墙壁以及障子贴满了金箔，真个是豪华绚烂。与此相比，利休只有一叠半大的茶室实在是寒酸。秀吉的黄金茶室代表的是权力和财富，以世俗的眼光来衡量，应该说是有价值的。但茶室既是求法修道的手段，那么，这种世俗的价值因其世俗而反为障碍。相反，利休从世俗的角度看无甚价值的一叠半的茶室倒具有了无比的价值。

与武野绍鸥一样，千利休也用一首和歌来表现自己的艺术境界，那是藤原家隆创作的和歌：

“莫等春风来，莫等春花开。雪间有春草，携君山里找（滕军译）。（滕军，1992：62）”

他还竭力强调淡素朴拙之美：花仅一朵，画只一幅，摆放质素、色沉的茶壶和形状歪斜不匀的茶碗，以天然的竹筒作舀水盛水的用具等等。

从珠光到绍鸥再发展到利休，草庵空寂茶最终得以完形。天正十七年（1589年），利休的弟子山上宗二在他所著的茶汤秘传书《山上宗二记》中，完整地记述了草庵茶的渊源流变过程。

追溯茶道的形成历史，我们发现，日本的茶文化从一开始就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中日佛教徒不仅将中国的佛教传入了日本，而且将中国的茶文化也传入了日本。日本茶道源于中国茶道，径山茶会是日本茶道的直接源头。在日本茶道的草创过程中，临济宗、曹洞宗禅僧，尤其是临济宗杨岐派虎丘系禅僧，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所谓的“茶禅一味”，就形象地道出了禅宗与茶道的法嗣关系以及饮茶与修禅、人境与佛境的相互交融关系。

二、茶道里的“山里”精神与“空寂”之美

（一）“山里”精神

由“山里”（汉语文脉中的“山居”）所代表的隐遁精神对日本文化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决定性的

① 日语作“侘茶”，汉语姑且据其意表述为“空寂茶”。